

让文学与影视彼此照亮

6月21日,“文学之光 影视闪耀——最具转化价值文学IP推介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会上,何向阳、谢飞、孙甘露、马伯庸作主旨发言。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以“新时代文学与影视相伴生长”为主题的圆桌论坛,论坛由杨蕊主持,阎建钢、张冀、徐则臣、石一枫、梁振华、张恒、梁萌等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展开深入对谈。本版特刊发主旨发言与圆桌对谈发言摘编,以期推动更多优秀文学作品实现影视转化,携手助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编 者

文学与电影:百年共生双向赋能

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上海——这座文学与光影交织的伟大城市,不仅书写了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百年共生的传奇,而且终将成为文学与电影对未来岁月双向赋能的有力见证。

自《诗经》开始,中国文学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1905年中国电影的诞生,为中国文学的长足发展和广泛影响插上了翅膀。1922年,电影《清虚梦》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1927年,电影《盘丝洞》出自吴承恩《西游记》;1928年,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在电影《火烧红莲寺》中涅槃重生。文学借由胶片一旦获得新的样态,生命新一轮的成长便开始启动。

鲁迅《祝福》,祥林嫂的凝望通过白杨的眼神看向我们,再次传达出女性向旧时代的哀怨发问;杨沫《青春之歌》,林道静经由谢芳的呐喊,还原了一个不甘于被动命运的理想主义“新女性”;鲁迅《伤逝》搬上银幕,我们知道了知识分子在新旧两个时代交迭期的新生与沉沦;而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电影传播则让更多人了解到抗战初期一代英雄儿女的勇敢与深情。

通过电影,鲁迅《阿Q正传》、茅盾《林家铺子》、柔石《二月》、巴金《寒夜》、老舍《骆驼祥子》、林海音《城南旧事》、沈从文《边城》《萧萧》重新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看到中国南方、北方以及西南边陲不同人们在同一时代的命运走向;通过电影,我们也看到了梁斌《红旗谱》、徐光耀《小兵张嘎》、周立波《暴风骤雨》、郭小川《一个和八个》、柯蓝《深谷回声》、莫言《红高粱》中反抗与斗争为主题的中国革命史中的非凡人生;通过电影,我们更认识了水华、崔嵬、谢铁骊、凌子风、谢晋、吴贻弓、谢飞、张军钊、陈凯歌、张艺谋。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黄建新《黑炮事件》、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关锦鹏《长恨歌》、冯小刚《一九四二》、曹保平《烈日灼心》无不出自张贤亮、彭见明、王安忆、刘震云、须一瓜的文学作品,而周大新、刘恒、张承志、王蒙、蒋子龙、冯骥才的原作经由谢飞、黄蜀芹、张子恩等人的重新阐释而变得更加动人、新颖。当文学经典具象为视觉史诗,我们获得了文学家与电影人对人类心灵的深度破译与双重建构。

马识途《盗官记》,由姜文重构为《让子弹飞》的黑色寓言,获得无数影迷的推崇;刘慈欣《流浪地球》,经郭帆启动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里程;许仲琳《封神演义》,通过饺子《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创新再造,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重新站回人类文化巅峰的可能性。文学为电影提供了不朽的精神母题,电影为文学拓展了无限的艺术天空。

百年共生的历史,是新一轮合作互动的起点。新时代长篇小说以其容积、体量与深度,显现出文学为电影赋能的优势。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近推出56部深具影响的长篇,连同今天发布的最具转化价值的文学作品,如若能和电影人碰撞出灵感火花,无论于文学、于电影,都会催生文学新质,抵达艺术高峰。

钱谷融先生曾言:文学是人学。文学为电影提供了直抵人心的精神密码;电影同样也是人学,电影是文学通向人心的重要桥梁。一些时刻,我们通过电影去寻找那部文学之书;一些时刻,我们阅读文学,会向往赋予它新的艺术能量。

此刻,愿我们——如我们的前辈,携手同行,让文学与电影彼此照亮,共同书写震撼世界的中国“乐章”。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研部主任)



从电影回望文学

□孙甘露

我想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一部电影说起。这部电影叫《爱玛》,根据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改编。我们假设读者和观众对简·奥斯汀的小说以及英国人言谈中的那种按捺不住的幽默有所了解。我想到了这部电影中的这样一段对话。

爱玛问弗兰克先生:您和费尔法克斯小姐熟不熟?

弗兰克回答道:跟一位女士熟不熟,那位女士说了才算。

如果我们仅仅用这段对白隐喻文学和电影的关系,那就辜负了简·奥斯汀那标志性的对婚姻和社交生活的精湛分析了。实际上,弗兰克先生和费尔法克斯小姐早已暗通款曲,秘密订婚了。

即使从中国电影的历史来看,文学和电影的这种联姻也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

文学的创作和电影的创作,都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但是我们不能把改编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从一种叙事方式向另一种叙事方式的转化。比如我想到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另一部电影——日本导演石川庆根据日裔英

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改编的《远山淡影》,它讲述了人们会在回望中重新“塑造”往事。而无论文字叙述所暗藏的不确定性,还是影像画面所呈现的相对明晰,都揭示了人物心理层面复杂的日常感知,探讨了人物的内疚和自欺。这种转化与揭示,由一个时代各个门类艺术家的合力创造而成。小说的叙事和影像的叙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它们不仅仅是叙事的手段,更是我们观看与理解世界的方式。

因此,我想任何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都不能被简单理解成“IP改编”,而是文学与影视从业者都深入地感知时代、感知社会、感知人,同时意识到两种门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并对时代中的种种变化作出自己的回应。

顺着绘画这个角度,我们或可借艺术史家石守谦尝试透过“画家与观众互动”这一角度对“山水之史”何以产生变革的思考,来反思如今文学与读者、电影与观众的依存关系,从中辨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中国作协的影视转化推广计划,都是富有远见和切实有效的一个举措。它从一个小的切入口,触及了文字和影像这两种人类最基本、最直观的交流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变化与发展也给人类认识并理解自身带来了广泛影响。

(作者系上海市作协主席)

历史文学的“当下性”思考

□马伯庸

姐,40多年没见的亲姐弟见面抱头痛哭。哭完以后,玄奘走近一看,父母的坟40多年没人修葺,也没有人上香,坟已经被风化得看不见痕迹了。他在给皇帝写的报告里,用了八个字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得比较含蓄,大概意思是想起当年的事情,情绪变得很不安定。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抱着父母的坟头嚎啕大哭。玄奘是中国的高僧,精通佛法。佛法讲的是断绝俗缘,达到彼岸,得到解脱。这让我们发现了什么呢?玄奘大师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对亲情深切的眷恋。

我讲完之后,一同参观的人都给父母打了电话。我忽然发现,科学技术一直在发展,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变,就是人性。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广为人知却被人误解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想表达的是,历史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档案历史,是枯燥、客观的记载;一种是“真历史”,需要用当代人的眼光、当下的精神去理解与激活。

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当下性,并不是要我们强行把现代的理念放到古代去。创作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古代题材中找到和现在的人情能够相通的内容,只有找到古今之间人性的共鸣之处,才能在历史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深刻,写出更多让当代读者感同身受的古代故事。

(作者系作家)

新时代文学与影视相伴生长



协副主席邱华栋读完小说后指出,吴承恩被确认为《西游记》作者,实则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先生考证的成果。这个时间逻辑的疏漏,我在第二版中及时做了修改。

操作文字的人要敬惜字纸,连我们自己都不珍视笔下的内容,又怎能要求读者尊重?影视创作同理。倘若创作者不尊重自己的影视语言,连最基本的信息交代都敷衍了事,错误百出,那你是单方面毁掉创作者和观众之间那个信任的契约,早晚也会被观众抛弃。所以,不管文学创作者还是影视创作者,都应该尽最大努力确保信息可靠、杜绝硬伤,这不仅关乎专业素养和尊严,也是对创作应有的态度。

石一枫(北京作协副主席)
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与原著最大的区别在于,原著聚焦好人之间的矛盾与悲剧故事,而电视剧则加入了明确的反派角色。回顾文学发展历程,“文学作品不应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的观念其实出现较晚,直到现实主义创作观念相对成熟后才逐渐提倡。在此之前,经典文学往往都有鲜明的反派形象,比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封神演义》里的纣王。

影视改编有同文学创作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改,还得编。改编不仅要对原著内容进行调整,更需要结合影视特性重新创作。如果单纯追求文学性,而忽视影视剧的创作规律,很可能面临失败风险。在制作上塑造一两个反面角色,并非意味着对世界的认知流于表面,更多是出于剧情推进的

需要,也便于观众更明晰地理解剧情。

在创作嬗变中坚守文学的尊严

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编剧、制片人)

什么样的作品需要改编?今天的年轻创作者又该具备哪些素养,才能适应文学与影视行业的发展变化?对此,我想到三个概念:一、老文学,即传统经典文学。这类作品在修辞技巧、叙事结构与哲学思考上的深度,是无法取代的。二、活文本。要通过了解身处同样知识结构和环境的创作者们的作品,窥见今日时代表达的样貌。三、新趣味。互联网文化诞生后给所有的叙事艺术带来趣味上的巨大冲击。如快节奏的“速食美学”、脱离现实的“悬空美学”,以及偏向轻松娱乐的“低幼美学”。如果我们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文学趣味,将难以用创作回应当下的时代课题。

此外,影视改编需要建立空间思维——作家习惯以时间线推进故事,而编剧则要优先构建场景与画面,让剧情在空间转换中自然展开;另一方面,要有戏剧思维,充分把握生活流、事件、戏、好戏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优秀的语言能力也不可或缺,这既体现在台词的撰写,也体现在剧本中除台词之外的叙述中。

杨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电影制作教研室主任)
电影艺术的根基,既深植于文学沃土,也依托于古老的故事原型。早在一万七千年前,在法国拉斯科岩洞中的原始壁画就已经开始诞生了故事,千万年来故事一直是我们内心力量的来源。尤其在当今时代,百年变局激荡,我们能够感受各个年龄层人群的变化,快餐化、碎片化的文化产品充斥于我们的生活时,激流中我们尤其需要稳固的精神基石。而文学跨越了所有历史周期,伴随着对永恒焦虑的有力解答,提供了牢不可破的稳定性。面对未来科技浪潮,我们期待作家与影视创作者共同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作为“人学”的尊严。

从文学中捕捉影视未来的发展方向

张恒(腾讯视频总编辑)

文学是影视的源头活水,影视为文学插上翅膀。无论影视发展有多快,我始终认为:文学在前,后有影视。小时候,我看西影厂的一部电影《野山》,我记着片名下有一行字:“改编自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这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文学与影视二者之间双向赋能的关系。同时,文学也是影视的源头。如今丰富多彩的影视作品,不少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得来的。我们常说文学引领影视两三年,捕捉影视的发展方向,研究文学就可以了。把握住文学,就可以找到未来两三年的影视方向。

梁萌(爱奇艺执行总编辑)

在媒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与影视的共生关系愈发显著。文学为影视提供思想深度与创作基础,影视则助力文学实现大众化传播,推动作品“破圈”。数据显示,爱奇艺过半获奖作品和热度破万的剧集均改编自文学作品。像《人世间》《北上》《我的阿勒泰》等改编剧热播后,原著小说销量也随之激增,充分展现了两者相互成就的潜力。面对未来,我们希望将文学IP系列化,进一步挖掘其商业价值与文化影响力。

文学改编影视,创作者需先思考三个问题:能否通过你的故事去唤醒和调动观众的好奇心?能不能达到基本的情感共鸣?能否引发观众的深度思考?《我的阿勒泰》一剧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在没有强情节,甚至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的情况下,通过主角文秀的成长线和情感线牢牢抓住观众;文秀母亲所代表的当代女性形象,其豁达、坚强的价值观更与当下观众形成深刻共鸣,为文学改编影视提供了成功范例。

(本文由本报记者许莹根据现场发言整理)

优秀文学作品为剧本赋能

张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

电影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它的创作法则。而文学创作更聚焦人物塑造、文学价值,以及对宏大主题和人的命运的深度探讨。对创作者而言,无论做何种类型的电影,都要找到创作主体,只有找准创作主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

如今,传统的单一电影类型创作模式正逐渐失去吸引力。电影在内容和主题的拓展上需要重新回归文学性,借助文学找到人物,找到叙事的升级,重塑人物塑造与叙事逻辑。

我去年有幸参与孙甘露小说《千里江山图》的电影改编工作。改编剧本中涉及14位人物,虽有核心主角,但配角群像同样戏份充足。这得益于原著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在改编中,如果做到多而不乱,人物差别和对立清晰,或许正是契合当下观众审美需求的关键所在。

阎建钢(中广联合会电视剧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导演)

就影视改编而言,我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另一种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二者是有区别的。我执导的作品中,约半数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创作这些剧目时,我特别有底气,因为这些作品与普通剧本截然不同,它们仿佛蕴含“核能”,无论处于哪个时代、采用何种表现手法,也不论演员阵容如何,都具备成就优秀影视作品的潜力。

电视剧改编的基本要求是故事性,需要以叙事性强的文学作品作为根基。然而,真正成功的改编不能止步于这一层,还要有第二层思想性。因此,除了引人入胜的故事,作家的思考是否具备当代价值也很重要。第三层是市场的接纳度。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本质上是面向市场的商品,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票房和收视率同样需要我们考量。

以符合影视创作规律的方式进行改编

徐则臣(《人民文学》主编)

在写作上我是个实证主义者,我写的东西尽量在我能力范围内让它落实,确保在硬知识上不出问题。我们常说,小说其实是以一种文学的方式给我们的当代生活留下一部“信史”。这个“信”字从哪里来?就是真实,就是“及物”。

以我的作品《北上》为例。初版中有个细节:1901年,中国翻译谢平遥陪同意大利人小波罗途经吴承恩故乡河下古镇,向对方介绍此地与《西游记》作者的渊源。后来,中国作